

垃圾焚烧厂邻避效应引发的选址困境探讨

易璟¹ 王薇²

1. 武汉市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 2. 第二作者武汉市城市管理技术研究中心

摘要: 垃圾焚烧厂是城市固废处理的关键载体, 其推动固废减量化与资源化发展的作用无法被替代, 项目选址却易受邻避效应影响难以推进。周边居民顾虑环境隐患、健康损害与信息公开不足, 这类情绪直接制约项目建设推进。梳理邻避效应的形成原因与外在特征, 搭建风险沟通、利益平衡、制度健全的治理框架, 缓和社会矛盾, 细化选址方案, 推动环境治理工作与社会接受程度达成适配。

关键词: 垃圾焚烧厂; 邻避效应; 选址困境; 风险沟通; 社会治理

DOI: 10.65976/3078-8145.2026.01.025

引言

城市化提速让生活垃圾产量持续增加, 垃圾焚烧已成主流处理手段, 设施选址往往引发公众抵触情绪, 形成典型邻避现象, 甚至演变为社会矛盾。技术可行性与社会认可度的矛盾, 让选址问题更为复杂。如何在保障环境安全的前提下获得公众充分理解与支持, 是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 相关探讨能推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更科学、更合理与更可持续。

1 垃圾焚烧厂选址中的矛盾表现

1.1 公众风险感知与信任缺失

垃圾焚烧厂选址易陷入邻避争议, 公众对环境风险的主观判断多高于技术评估结论。二噁英、重金属、恶臭气体、飞灰处置相关问题, 易引发居民对健康与生态受损的联想。成熟烟气净化工艺与排放控制标准仍难消除居民因认知偏差形成的心理戒备, 高危设施贴近生活空间的感受始终存在。选址环节这类感知会快速转为集体抵触, 工程布局问题就此演变为社会心理层面的博弈。社区传播会不断放大个体不安情绪, 逐步构建群体性认知框架, 加深对项目的负面判断。缺失高效沟通与回应渠道, 情绪会被进一步激化并形成行动层面的压力, 干扰技术与规划导向的决策流程, 增大选址推进的变数。

信任不足会持续放大风险感知, 弱化政府及建设方的阐释效力, 部分区域项目推进存在论证流程封闭、反馈滞后、专业表述难懂等状况, 公众无法对环评、排放监测、应急管理体系形成稳定信赖。前期沟通基础薄弱时, 居民会借助网络舆情、社区组织、集体发声维护自身居住权益。选址难题跳出技术可行性核查范畴, 转为公信力不足带来的程序争议与社会接受度下滑问题。决策环节缺少公开性与公众参与环节, 易被判定存在信息隐匿或流程简化, 降低政府及项目方

的公信力。公众不认可评估结论, 技术层面合理的选址方案也无法获得认同。社会舆论与基层诉求持续叠加, 局部争议逐步升级为公共话题, 进一步加大选址落地的阻碍。

1.2 信息不对称与沟通障碍

垃圾焚烧厂选址推进过程中, 信息不对称是激化邻避效应的重要诱因, 项目单位可全面掌握工艺参数、排放标准、环境容量测算和安全防控预案等核心信息, 普通居民接触到的内容多为零散碎片化消息, 很难搭建起完整的认知体系^[1]。这类情境下, 公众易凭借日常生活经验替代专业技术判断, 直接把焚烧处理归为高污染排放行为, 忽略现代焚烧技术在垃圾减容、减量及能源回收利用层面的实际应用价值。信息供给与公众认知理解之间存在明显断层, 会降低选址论证工作的透明度, 也会让社会层面的相关讨论脱离科学轨道。

沟通障碍还体现在表达机制不顺畅、互动方式单一两个方面。部分项目在公示、听证或意见征询环节仅完成流程性工作, 缺少针对性答疑与持续性解读, 居民提出的污染控制、运输路线、灰渣处理去向等具体问题无法得到及时回应, 逐渐产生“被动告知”的负面心理。风险沟通缺少双向互动交流, 便无法完成公众认知校正与情绪疏导。现实场景中, 多数矛盾并非技术本身存在缺陷, 而是专业信息未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验证、可监督的通俗内容, 最终让选址协商工作失去稳固的实施基础。

1.3 利益分配失衡引发抵触

垃圾焚烧厂作为典型公共服务设施, 运行带来的效益覆盖城市整体发展, 各类环境影响与心理压力却主要由厂址周边居民承担。公共层面整体受益、局部区域单独承压的分配模式, 极易让周边群众产生强烈

的不公感受。土地价值波动、居住环境预期下滑、日常居住品质受干扰等现实问题,对当地居民而言有着更直接的切身影响。补偿方案落地滞后、环境改善举措缺失、公共服务配套回馈不足时,居民会直观将项目选址视作外部成本向自身社区的转嫁,由此滋生抵触心理。

利益失衡还体现在决策权限与风险承担程度的不对等上,项目建成后周边居民需直面邻近带来的各类潜在影响,却难以在选址决策环节获得有效参与渠道,程序与分配层面的公平性都会引发质疑。仅靠单次经济补偿,无法回应居民对长期环境安全的顾虑、社区长远发展的需求以及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深层诉求。化解这类抵触情绪,需构建与风险承担程度相匹配的利益调节体系,将生态补偿、社区共建协作、公共设施完善、长期数据监测与信息公开全部纳入制度框架,让承受公共设施外部影响的周边群体,都能获得切实、稳定且可直观感知的权益保障,平衡整体公共利益与局部居民诉求,推动项目平稳落地推进。

2 邻避效应影响选址的内在机制

2.1 环境与健康预期的放大效应

垃圾焚烧厂选址引发邻避效应的关键诱因,是公众对环境与健康后果的预期往往会明显放大趋势。焚烧设施一旦与居住区、学校或医疗机构距离过近,居民就会把空气质量下降、异味扩散、噪声干扰以及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等问题关联在一起,更担心二噁英、酸性气体、颗粒物和重金属的长期暴露风险。这种预期并非完全基于实际监测数据,多半依靠直观印象与生活经验,带有明显的感知强化特征。选址阶段一旦有“可能影响健康”的判断,公众容易将潜在风险上升为现实威胁,对项目产生持续性排斥。

健康预期被不断放大的过程,与风险传播链条中的不确定性紧密关联,居民很难准确分清达标排放、累计暴露、环境容量和毒理阈值等专业概念,专业技术语言与日常认知之间的差距,让污染控制承诺无法转化成稳定信赖。实际上,部分地区就算配备了完善的烟气净化系统、在线监测装置和飞灰安全处置方案,周边居民还是会顾虑设备故障、监管失灵或企业压缩运行成本,造成潜在污染突破控制范围。选址困境不只是来自设施本身,而是来自环境风险预期、健康焦虑与不确定性认知交织而成的放大机制。

2.2 社会心理与群体行为作用

垃圾焚烧厂邻避效应的形成,关联个体风险判断,也受社会心理机制影响,居民面对贴近日常居住空间的设施布局,会自然形成领域防卫意识,对居住安全、

财产价值与社区整体形象保持高度敏感^[2]。焚烧厂在此语境下脱离普通城市基础设施范畴,被视作直接影响区域环境品质的外部压力源。心理学层面的损失规避特征在此充分显现,公众对潜在损害的关注度,远超垃圾减量、能源供给与公共治理带来的正向效益,选址议题就此转向情绪主导的社会讨论。

群体行为的参与,放大邻避效应的扩散范围与组织程度,个体零散的担忧,经社区交流、网络传播与舆论互动不断汇聚,逐步形成统一立场与行动导向。信息在群体内部流转时,易出现选择性接收与情绪共鸣,快速催生群体层面的风险共识。部分居民借助业主团体、社区联名、网络动员提出反对态度后,其他住户会受从众心理、身份认同与利益关联影响主动参与抵制。选址争议最终脱离单一住户的主观感受,演变为具备群体动员属性的社会行为,周边矛盾不断叠加,整体治理的复杂程度与推进难度也随之大幅提升。

2.3 制度安排与决策方式局限

垃圾焚烧厂选址困境反复出现,与制度安排结构性局限直接关联,部分地区项目推进侧重行政效率与建设进度,轻视程序协商、信息反馈与利益整合,选址论证呈现单向决策态势。环境影响评价、规划公示、公众参与等环节形式完备,实际运行中参与深度不足、意见吸纳有限、反馈机制薄弱问题突出。居民难通过制度化渠道充分表达关切,不满转向公共舆论与线下抗议,可协商分歧升级为选址僵局。

决策方式局限凸显跨部门协调不足与治理责任分散,垃圾焚烧厂建设牵涉规划、生态环境、住建、城管、应急管理主体,缺少统一协同机制,易出现标准解释不一、职责边界模糊、监管信息脱节。项目论证侧重工程可行性,社区治理部门未介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技术审查与社会接受机制割裂。长远看,单靠末端说明、被动回应难化解邻避效应,需制度层面完善公众参与程序、风险沟通规则与全过程监督体系,从决策源头减少选址矛盾积累。

3 缓解选址困境的路径探索

3.1 完善信息公开与风险沟通机制

垃圾焚烧厂选址要走出邻避困境,核心在于将信息公开从单纯的程序性要求,真正转化为破解争议、凝聚共识的实质性治理手段。项目启动之初便需同步全面披露选址的核心依据、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具体的污染防治工艺参数、烟气处理的全流程步骤、飞灰安全处置的详细方案以及在线监测的各项核心指标,让公众能够清晰、全面地了解设施的运行边界、风险控制的具体路径以及各项防控措施的可性。信

息公开不能仅仅停留于专业文本的简单堆砌,还需通过直观的可视化数据图表、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以及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技术解读,切实降低公众的理解门槛,有效避免因专业术语壁垒造成的认知误判和信息偏差。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二噁英排放限值标准、渗滤液处理的实际效能、无组织废气管控的具体措施等核心问题,应建立常态化、动态化的持续更新机制,实时公示相关数据,以此不断提高环境信息的透明度,提升监管工作的公信力。

风险沟通机制的有效性,关键不在于单向的信息告知,而在于构建平等、高效的双向互动模式。面对居民普遍担忧的健康损害风险、区域环境承载容量、事故外溢后的应对措施等问题,政府部门、项目建设企业与专业技术机构需要通过定期的听证座谈、社区专场说明会、设施现场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开展常态化沟通交流,将专业的评估结果与公众的实际感受、合理诉求有机结合起来。沟通过程中,应主动引入风险传播、环境心理学、公共管理等相关领域的专业方法,针对老年群体、周边常住居民等高敏感群体的担忧,进行精准、有针对性的回应,及时疏导负面情绪,避免情绪不断累积后演变为大规模的集体抵触行为。

3.2 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商平台

破解垃圾焚烧厂选址难题,不能仅依靠行政主导的单线推进模式,而需搭建多方参与的协商平台,把利益相关者纳入统一治理框架。平台涵盖政府部门、建设单位、属地社区、专家团队、社会组织与居民代表,依托制度化协商完成议题共商、风险共判、责任共担^[3]。选址论证需考量工程技术条件与空间布局合理性,将交通组织、环境承载、社区承受度、区域发展诉求归入综合研判。

依托协商平台,零散的反对意见可转化为可讨论、可记录、可回应的治理议题,提高决策的程序正当性。协商平台发挥实效,需完善议事规则与反馈机制,居民参与跳出形式性征询范畴,在议题设置、方案比选、风险评估、后续监督中拥有实质表达空间。针对选址半径、运输线路、厂区防护距离、应急预案等重点事项,借助专题协商、专家答辩、公开质询形成多轮互动,推动技术语言与公众诉求高效对接。平台内部搭建意

见归集、分歧协调、结果公示机制,避免协商流于形式。

3.3 优化利益补偿与制度保障体系

垃圾焚烧厂自带鲜明公共属性,空间外部性却多由周边社区优先承载,需优化利益补偿机制,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再平衡。补偿方式不应局限于一次性经济支付,结合区域发展实际,搭建长期化、复合型补偿体系,涵盖生态补偿、公共服务配套、社区环境整治、医疗资源支持及基础设施升级等内容。受影响较大的周边区域可设立社区专项发展基金,专项用于区域绿化提升、空气质量实时监测、道路设施改善和公共空间优化,让居民切实感受到设施落地带来的现实回馈。将补偿安排与社区福祉提升深度结合,才能实质性缓解邻避抵触情绪。

制度保障体系的完善,是利益补偿长期发挥效用的关键前提,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建设与运营需纳入全过程法治化管理,构建涵盖风险评估、程序监督、排放监测、责任追究及争议处理的闭环机制。运行阶段尤其要强化在线监测数据公开、第三方环境审计和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制度,杜绝补偿承诺与实际执行脱节。针对公众最关注的排放达标、飞灰处置安全及异味控制问题,建立常态化监督与问责机制,让制度保障具备可操作性与可验证性。

4 结语

本文针对垃圾焚烧厂邻避效应带来的选址难题开展系统分析,从公众风险感知偏差、信息传递不畅、利益分配不均等角度梳理问题成因,挖掘社会心理与制度层面的深层作用逻辑。以此为基础构建化解思路,通过健全信息披露机制、搭建多元协商平台、完善利益补偿方案推动矛盾解决,平衡技术应用合理性与社会接受程度,保障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落地建设平稳推进。

参考文献:

- [1] 李鹏飞. 公共价值视角下邻避冲突生成逻辑及治理路径研究 [J].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25(4):52-57.
- [2] 梁若雪. 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与化解机制 [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2):79-85.
- [3] 赵慧莹. 公众对垃圾焚烧设施的邻避补偿偏好及异质性研究 [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4.